

家庭资本与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

——基于江苏省 B 县初中后教育分流的分析

朱新卓 骆婧雅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教育机会存在质量高低之分, 学生的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也有质量分化, 这对于其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乃至未来的职业获得都具有关键性影响, 因而是教育公平研究的主题之一。学生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本研究探讨学生家庭资本与其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之间的关系。对江苏省 B 县初中后分流情况的调查分析发现, 对一般普高和优质普高(相较于职高)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方面, 经济资本无显著作用, 而社会资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文化资本有正向影响但弱于社会资本; 对于优质普高(相较于一般普高)的教育机会获得, 只有文化资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家庭资本的各因素中, 主观性因素虽然有助于弱势阶层子女获得一般普高入学机会, 但客观性因素会对其获得优质普高入学机会产生制约。因此, 政府应推进“指标到校”政策, 促进优质普高生源的均衡分配; 弱势家庭应积极培养家庭文化资本, 学校和社区也要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以弥补该群体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 从而提升其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

关键词 教育获得; 家庭资本; 高中阶段教育机会; 初中后教育分流

DOI: 10.19992/j.cnki.1000-2456.2022.01.0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新时代我国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研究”(BHA180137)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我国越来越关注教育公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将“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要“推进教育公平,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021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可见, 教育公平问题已成为我国教育政策的重要关切。其实教育公平问题也一直是教育社会学和社会分层流动研究的重要议题, 而教育机会获得的公平作为衡量教育公平的重要指标, 更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

国内关于教育机会获得公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大致有以下三种视角: 一是从社会政治变迁及经济体制转型的视角研究宏观结构性因素与教育机会获得之间的关系^①; 二是从制度性因素入手, 分析国家宏观政策干预(如户籍制度、教育财政制度、就近入学制度等)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抑制或加剧作用^②; 三是强调家庭背景因素(如父代职业、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对个体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③, 这也

① 参见 Yuxiao Wu, “Cultur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49—1996,”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 51, no. 1, 2008, pp. 201-227.

② 参见何宗樾、宋旭光:《公共教育投入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 机制分析与差异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19 年第 7 期。

③ 参见刘志民、高耀:《家庭资本、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获得——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11 年第 12 期。

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已有研究主要着眼于教育机会获得在量上的不平等——某一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在不同群体子女中的分布是否公平,例如,“谁”能上高中,“谁”能上大学,“谁”在升学竞争中被淘汰了,忽视了同一学段教育机会存在质量差异和等级分化,以及教育机会获得在质量维度上的公平问题。在我国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已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有学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上好学”成为广大民众最为迫切的需求,优质教育资源成为竞争的焦点。因此,当前研究教育机会获得的公平问题,首先应当区分教育机会的优质程度和质量差异,进而考察不同群体是否公平地获得各种质量等级的教育机会。

从质量和内涵的层面分析各学段教育机会的质量差异,要从学制体系与教育分流开始。在我国的学制体系中,一次次教育分流,把学生从相对较为均衡的义务教育阶段分流到教育质量高低不等和教育资源优劣分化的高中阶段与高等教育中。其中,学生在初中后被分流到何种质量和类型的高中,是学生之间受教育生涯分殊分化的起始性和关键性节点。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初中后教育分流作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分水岭,是每位学生都必须面对的教育筛选。其次,初中后教育分流是我国学制体系中的第一次制度化分流。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读学校的选择不是依据学生的学业表现,而是服从地方政府“划片就近入学”的教育安排,只有初中后分流到不同类型和质量等级的高中才是根据学生的学业考试成绩进行的教育分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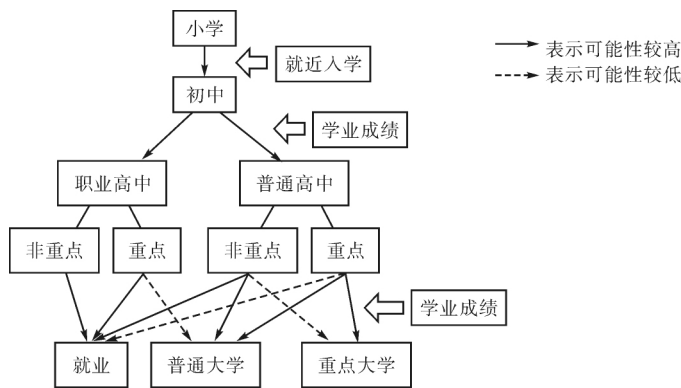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教育分流实践的基本脉络

再次,初中后分流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累积性和延续性(见图 1),学生进入的高中学校类型与质量直接影响其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与层次,进而影响到其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因此,本研究将调查学生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差异。

学生的教育机会获得受到社会结构、国家政策、家庭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是较之于社会结构、国家政策等宏观因素,家庭资本更能揭示教育机会获得的微观机制,且家庭资本中的部分内容是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能够改变的,因此具有更强的教育意义。所以,本研究以家庭资本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学生家庭资本对其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进而为学生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不平等提供解释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家庭经济资本与学校教育机会获得

经济资本是指用于生产商品、服务的金钱和物质资料。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家庭收入来测量家庭经济资本^①。此外,有研究者把父母拥有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各种资产(如房屋、汽车等)总和作为测量经济资本的重要指标^②。另有研究者不直接以家庭收入作为经济资本的指标,而是以家庭运用到子女教育上的物质投资作为经济资本的测量指标,如参加校外培训班的费用^③、购买学习用品的费用等^④。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教育学家就开始关注学生家庭经济资本对其教育机会获得

① 参见郭丛斌、闵维方:《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2006 年第 11 期。

② 参见 Mads Meier Jeger and Richard Breen, “A Dynamic Model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21, no. 4, 2016, pp. 1079-1115.

③ 参见朱晓文等:《青少年教育期望的阶层差异——基于家庭资本投入的微观机制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④ 参见 J. D. Teachman,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no. 4, 1987, pp. 548-557.

的影响。多项研究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经济资本较丰裕的家庭可以为子女提供优质学校的入学机会和市场化的教育资源,从而使其在教育分流中向优势位置流动^①。国内诸多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结论^②,并发现随着社会分化加剧,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以及教育市场化的形成,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呈现出加强的趋势^③。

此外,国内外也有研究发现,随着子女从基础教育阶段向高等教育阶段过渡,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呈下降趋势^④。对于这一变化趋势,学界存在三种解释路径。生命历程理论认为,随着个体生命阶段的推移,子女逐渐降低对家庭经济资本的依赖,因而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将随着教育阶段的提高而减弱^⑤。Mare 提出的“社会选择假设”认为,每个教育阶段都会淘汰部分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导致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其家庭背景、学业表现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因此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呈现出减弱的趋势^⑥。Breen 等人提出的“绩效选择假设”认为,由于高等教育的筛选机制是学业表现而非家庭经济资本,所以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会降低甚至消失^⑦。

(二)家庭文化资本与学校教育机会获得

文化资本泛指“一些被广泛接受的高层次文化信号,这些文化信号被用来进行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区隔”^⑧。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具身化(embodied)文化资本,它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常被操作化为出席或参与高雅文化活动、阅读习惯与文学氛围、关于文化话题的亲子沟通频率等指标^⑨。此外,我国有学者从威斯康星模型^⑩中受到启发,指出家长教育理念(如对子女教育的态度、期望等)对孩子的影响是通过漫长的时间积累的,与具身化文化资本的习得或惯习的养成过程一致,因而,也可将其视为具身化文化资本的重要体现^⑪。二是客观化(objectified)文化资本,它以物质性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存在,国内外常用“家庭文化产品存量”(如家庭藏书量)来代表^⑫。三是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文化资本,它以合格文凭或资格认定证书的形式存在,多被操作化为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⑬。

关于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机制,长期以来存在两种理论论争。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理论强调社会及文化结构的力量,认为文化资本会复制甚至扩大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⑭。而以迪马乔为代表的“文化流动”(Cultural Mobility)理论发现了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流动的可能性,认为文化资本有助于文化资本拥有者的教育机会获得,而不仅仅被优势阶层垄断。弱

① 参见 G. J. Duncan, A. Kalil and K. M. Ziol-Guest, “Increasing Inequality in Parent Incomes and Children’s Schooling,” *Demography*, vol. 54, no. 5, 2017, pp. 1603-1626.

② 参见刘精明:《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③ 参见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④ 参见唐俊超:《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

⑤ 参见 Karl Ulrich Mayer and Urs Schoepfli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5, no. 1, 1989, pp. 187-209.

⑥ 参见 Robert D. Mare, “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75, no. 370, 1980, pp. 295-305.

⑦ 参见 Richard Breen and John H. Goldthorpe, “Class Inequality and Meritocracy: A Critique of Saunders and an Alternative Analysi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0, no. 1, 1999, pp. 1-27.

⑧ Michele Lamont and Annette Lareau,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6, no. 2, 1988, pp. 153-168.

⑨ 参见 Gerbert Kraaykamp and Koen van Eijck,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produc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A Three-fold Perspective,” *Social Forces*, vol. 89, no. 1, 2010, pp. 209-231.

⑩ 威斯康星模型主要关注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社会心理过程。研究者将一些社会心理变量如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态度、鼓励、期望等加入地位获得模型,作为影响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中介变量。研究发现,教育期望等社会心理变量是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解释变量。

⑪ 参见周怡等:《社会分层的理论逻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3页。

⑫ 参见 Douglas B. Downey, “When Bigger is Not Better: Family Size, Parental Resource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no. 5, 1995, pp. 746-761.

⑬ 参见郭丛斌、闵维方:《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11期。

⑭ 参见 Mads Meier Jeger and Richard Breen, “A Dynamic Model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21, no. 4, 2016, pp. 1079-1115.

势阶层子女可以通过有意识地积累优势文化资本,缩小与精英阶层子女的差距,从而实现升迁性的社会流动^①。此外,弱势阶层特有的“底层文化资本”,如勤奋、坚韧的个性品质、崇尚知识、尊师重教的家庭氛围等,也能够部分地抵消缺乏高雅文化资本所导致的学业劣势,并转化为自身实现升迁性社会流动可利用的优势^②。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文化资本的作用提出质疑,认为文化资本对教育机会获得影响有限,并尝试提出多元化的解释路径。一是基于社会转型的视角,认为“文化品位和惯习的民主化”打破了精英阶层通过文化边界缔造的阶级区隔,大大降低了文化资本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权重^③。二是考虑到东亚教育体系的特殊性。韩国与日本的相关研究发现,强调标准化评价体系 and 规范化课程设置的东亚教育制度会抑制文化资本对子代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甚至会产生一定的负效应^④。

(三)家庭社会资本与学校教育机会获得

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学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差异较大。其中,布迪厄提出的“网络资源”(network resource)型社会资本和科尔曼提出的“社会闭合”(social closure)型社会资本应用最广。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基于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所获得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取决于其可以有效运用的网络规模的大小和网络成员凭借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数量的多少^⑤。科尔曼则认为闭合性的社会网络更有利于社会资本的产生^⑥,即社会网络的封闭性越高,代表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裕。社会网络涵盖代际关系(re-lations across a generation)和代内关系(relations within a generation)(见图2)。前者又被称为家庭内的社会资本,特指家庭内的亲子互动关系,如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交流、对子女的监督、学业指导等;后者即家庭外的社会资本,指父母在家庭外的人际关系,例如邻里相处、与子女任课教师/班主任的联系、与子女朋友及其父母的联系等。在教育研究领域,国内外多数经验研究都遵循科尔曼的研究路径,探讨家庭社会网络的闭合程度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⑦。布迪厄的“网络资源”取向虽然近年来受到不少关注,但较少被应用到教育问题的实证研究中。因此,本研究主要沿用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和操作化方式。

根据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大致分为三条路径。一是通过家庭内部关系网络。国内外经验研究表明,经常与孩子讨论学校事宜和学业上的问题,能够帮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⑧。父母对子女的监督、指导对其教育机会获得无显著影响,甚至存在负效应^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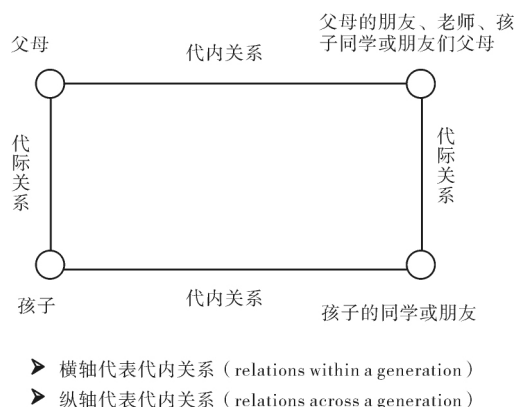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闭合结构

① 参见 Karen Aschaffenburg and Ineke Maa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areer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2, no. 4, 1997, pp. 573-587.

② 参见董永贵:《突破阶层束缚——10位80后农家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质性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3期。

③ 参见 Tally Katz-Gerro, “Highbrow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Class Distinction in Italy, Israel, West Germany,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vol. 81, no. 1, 2002, pp. 207-229.

④ 参见 Soo-yong Byun, E. Schofer and Kyung-keun Kim, “Revisit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Eas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85, no. 3, 2012, pp. 219-239.

⑤ 参见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

⑥ 参见 J. S.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4, 1988, pp. S95-S120.

⑦ 参见李晓哈、郑磊:《社会资本起作用吗?——农村家庭的代际闭合与儿童学业表现》,《教育学报》2016年第3期。

⑧ 参见 C. R. Martinez, D. S. DeGarmo and J. M. Eddy, “Promoting Academic Success among Latino Youth,”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26, no. 2, 2004, pp. 128-151.

⑨ 参见 Laura Walter Perna and Marvin A. Tit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a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Enrollment: An Examination of Racial/Ethnic Group Differences,”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76, no. 5, 2005, pp. 485-518.

不过也有研究指出,这一研究结论并不适用于亚裔群体和东亚学生^①。二是通过家庭与学校间的网络连接。家长积极参加家长会和学校活动,主动与老师讨论子女的学习情况和在校表现,对子女的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三是通过社区内社会关系网络。社区内家长间的交流与互动越频繁,其子女越有可能获得学业上的成功^③。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内涵、操作化及其对教育机会获得影响的研究已有一定进展,研究结论普遍证实家庭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这些经验研究大多探讨单一类型的家庭资本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而较少关注这三类家庭资本在教育机会获得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以及相互间的联系。此外,在家庭资本的测量上主要将三类家庭资本简单操作化为家庭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阶层地位等客观性因素,而对家长教育理念、亲子关系、行为监督等主观性因素关注不够,使得现有研究对家庭资本在子女教育机会获得中的实际运行机制所知不多。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试图结合家庭资本中客观性因素与主观性因素,为家庭资本探索一种更全面且切合实际的操作化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家庭资本各要素对子女高中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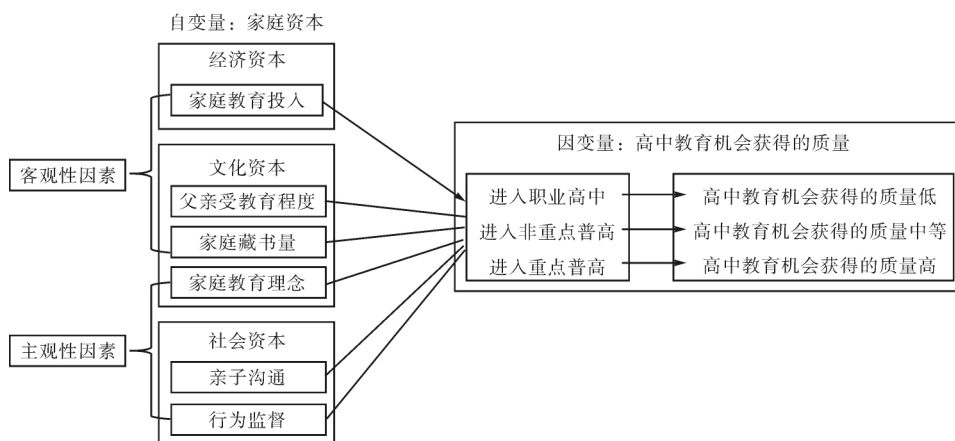


图 3 分析框架

首先,经济资本是影响子女高中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重要客观性因素。经济基础雄厚的家庭,能够为子女提供优越的教育条件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建构良好的学习环境,例如购买学区房、聘请家教、选择校外培训机构等,此类经济投入有助于提高子女的学业成就,并进一步转化为优质高中教育机会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换言之,家庭经济资源需要转化为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才能更为直接地影响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有正向影响,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越多,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越好。

其次,国内外诸多经验研究证实,家庭文化资本能够影响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家庭,通常会更加重视子女接受教育的质量,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如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使子女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进而转化为教育竞争中的优势。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具有正向影响,家庭文化资本越多,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越好。

在影响子女高中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诸多文化资本因素中,制度化文化资本与客观化文化资本属于

^① 参见 Lian-Hwang Chiu, "Child-Rearing Attitudes of Chinese, Chinese-American, and Anglo-American Mot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22, no. 6, 1987, pp. 409-419.

^② 参见 R. D. Stanton-Salazar and S. M. Dornbusch,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Information Networks among Mexican-Origin High School Studen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68, no. 2, 1995, pp. 116-135.

^③ 参见 Stephen L. Morgan and Jennifer J. Todd, "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High School: A New Evaluation of Coleman's Conjectur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82, no. 3, 2009, pp. 267-285.

客观性因素,具身化文化资本属于主观性因素。具体而言,第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重要体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往往更熟悉学校的规则,拥有更多与学业相关的有用信息以及提高子女学业成绩的成功经验,也更注重培养子女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习惯,帮助他们更好地领会学校课程。而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的家庭,虽然“望子成龙”心切,但相对缺乏子女教育的成功经验和相关知识,难以承担对子女学业的指导与辅导,导致子女在优质高中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可能会居于劣势。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a:家长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越好。

第二,家庭藏书量是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具体体现。藏书量不仅直接体现了家庭物质文化资源的多寡,也可以反映出家庭文化氛围和底蕴的深厚程度。家长可以通过加大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帮助子女获得高质量的高中阶段教育。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b:家庭藏书量越多,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越好。

第三,家长教育理念是具身化文化资本的重要内容,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对教育价值的认可、对子女学习的要求和支持等。当父母对子女有较高的教育期望时,就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孩子的学业表现,主动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为其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并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言传身教,使孩子认识到教育对个体未来发展的重要价值,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子女自身的教育期望,激发子女的教育成就动机。因此,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质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c: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越高,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越好。

再次,近年来,社会资本也被认为是解释教育机会获得过程的重要因素。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有所区别的是,社会资本强调的是主观性因素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消解客观性因素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强大约束。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越多,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越好。

家庭内社会资本包括亲子沟通和行为监督。其中,亲子沟通是指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通过交换资料、信息、观点、意见、情感和态度等,达到相互了解、信任与合作的过程^①。诸多国内外经验研究发现,亲子间的交流互动不仅能够通过影响儿童的学习态度和行为间接影响其学业成绩,更能够直接作用于儿童的学业成绩^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a:父母与子女的沟通越好,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越好。

行为监督是指家长基于既定的标准要求,管理和监督子女日常的学习与生活,对不良举止和行为进行规范,使孩子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进而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国外相关研究大多指出,父母对子女过多的控制和干预、父母对家庭作业的帮助和干扰,与子女的学业成绩呈负相关^③。这一点在赵延东等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④。但也有研究持反对意见,认为亚裔家长更倾向于通过对孩子施加更多的控制和限制帮助其在教育竞争中获胜^⑤。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b:父母对子女行为的监督越多,子女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越好。

家校沟通是家庭外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家长通过与学校老师的沟通交流,能够获知孩子在学校中的学习状况和学习内容,有利于各种关于孩子学习与生活信息的交流和传递。积极参与学校教育也能让老师感知到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进而与家庭教育形成合力,更好地监督、鼓励和促进孩子学习,从而提高子女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c:家长与学校老师沟通的频率越高,子女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越好。

^① 参见侯利明、雷鸣:《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基于亲子互动模式的潜在类别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② 参见李忠路、邱泽奇:《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③ 参见 Roy A. Bean, Kevin R. Bush, Patrick C. Mckery and Stephan M. Wilson, “The Impact of Parental Support, Behavioral Control, and Psychological Control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elf-Esteem of African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vol. 18, no. 5, 2003, pp. 523-541.

^④ 参见赵延东、洪岩璧:《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与社会闭合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⑤ 参见 Chin-Yau C. Lin and Victoria R. Fu, “A Comparison of Child-Rearing Practices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Chinese, and Caucasian-American Parents,” *Child Development*, vol. 61, no. 2, 1990, pp. 429-433.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资料来源于课题组对江苏省 B 县 2017 届初中毕业生家庭教育与教育分流关系的调查数据。

众所周知,我国各个地域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事业发展状况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导致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存在地域差异。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中,县域是分析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状况、资源配置和高中阶段教育机会的基本单位。此外,我国高中阶段学校的招生范围也基本上限制在县域内,公办普通高中未经批准不得跨县域招生^①。因此本研究以江苏省 B 县为案例,深入地研究 B 县学生家庭资本与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之间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他县域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情况^②。

B 县位于江苏省偏北部,多为平原,总面积 1467 平方千米,下辖 14 个镇、1 个开发区,人口约 90 万,2020 年底开通火车,属于农业大县。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2018)》对江苏省 54 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的综合评价,B 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全省中等地位。2017 年 B 县普通高中升学率为 56.4%。B 县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在全国县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B 县有普通高中 5 所,职业高中 1 所。此次调查以 B 县 6 所高中的高一学生为抽样对象,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按照学生总数的 1/5 抽取了 902 个样本。考虑到选取的 5 所普通高中内存在班型差异且重点班学生少于普通班学生,因此在单个学校抽样时,重点班采用间隔抽取的方式抽取单号学生,普通班按整个班级随机抽取。此外,Y 校(职业高中)主要按照专业分班,因此在抽样时涵盖了不同专业的学生。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902 份,剔除无效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861 份,有效回收率达到 95.5%。

(二)变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受访者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所以本研究将初中毕业生进入的不同高中划分为不同的质量等级,以此作为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区分。

B 县的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工作全部采取志愿录取的方式,即依据考生的投档分数和志愿按批次由高到低依次录取。B 县高中阶段招生志愿共设置三个批次:第一批次为 E 校;第二批次为 D 校、C 校、B 校、A 校;第三批次为职业高中 Y 校。根据参与调查学校的招生录取批次,本研究将 B 县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由高到低划分为三个等级:E 校作为 B 县唯一一所参加中考第一批次录取的高中,划为优质普高^③,为第一等级;D 校、B 校、C 校、A 校划为一般普高,为第二等级;Y 校划为职业高中,为第三等级。进入职业高中视为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低,赋值为 0;进入一般普高视为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中等,赋值为 1;进入优质普高视为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高,赋值为 2^④。

2. 自变量

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只有转化为家庭教育的经济投入,才能更为直接地影响子女的教育机会获得。因此,本研究采用家庭年教育投入来测量家庭经济资本。家庭年教育投入包括家庭每年用在校外培训方面的花费,为分类的区间变量,在分析时取区间中间值的对数,数值越高,表明家庭经济资本越多。

家庭文化资本:本研究分别使用家长受教育程度、家庭藏书量以及家长教育理念测量制度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具身化文化资本。以往的研究在测量家长受教育程度时多以父亲受教育程度作为测

^① 2019 年 5 月教育部下发《关于严格规范大中小学招生秩序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所有普通高中学校(含民办高中)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时间、招生方式进行统一招生,严禁跨审批区域招生。

^②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主要取自一个县域,因此研究结论仅仅反映了县域内高中教育获得质量的基本情况,可能与大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县域(区)情况存在差异,这也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③ 普通高中中具有“地位取向”,职业高中中具有“生存取向”,二者在赋予个体升迁性社会流动的能力上存在差异;普通高中中的优质普高是各级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与一般普高相比,在生源、师资、教育质量、升学率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升学率等诸多方面都拥有很大的优势。

^④ 把进入职业高中视为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低,虽不符合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职业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但符合我国高中阶段招生和录取的实际情况。

量指标,因此本研究在这里亦采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并在分析时将其按照一定规则换算为受教育年限^①;家庭藏书情况即受访者家中的藏书量(不包括报纸杂志),为分类的区间变量,分析时取区间中值。家长教育理念反映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主要涉及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对子女学习的要求、对文化/知识的态度以及对子女学习的支持等。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4,总取值为4—16之间的整数。

家庭社会资本:根据常用的操作化方式,将家庭内社会资本分为“亲子沟通”和“行为监督”两个部分,其中“亲子沟通”包括6个项目,Cronbach'α系数为0.881,“行为监督”包括6个项目,Cronbach'α系数为0.81。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记为1—4分。家庭外社会资本则由家长与班主任/任课老师交流的频率来反映,这是一个定序变量,从“从不交流”到“经常交流”记为1—4分。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共4个控制变量,分别是性别(1=女,2=男)、家庭居住地(1=城镇,2=农村)、同胞数量(1=独生子女,2=非独生子女)和就读初中类型(1=城镇初中,2=农村初中)。

(三)缺失值处理办法

由于“家庭年教育投入”变量的缺失数据比例达到28%,因此对分析样本中的缺失值采用多重插补法(multiple imputation)。我们在多重插补计算模型中纳入所有变量,插补缺失值后得到10个独立的数据集,分别对这10个数据集进行统计分析,最后综合这些数据的处理结果,形成对模型的估计。

(四)数据分析方法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三分类的类别变量,因此采用分层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此模型是用于解释自变量X在预测因变量Y发生概率时的作用和强度,并且因变量Y具有多种取值类型。在统计分析时先以“进入职业高中”为参照,比较其与“一般普高组”和“优质普高组”的差异,再以“进入一般普高”为参照,着重对比其与“优质普高组”的差异。

五、数据分析结果

(一)家庭资本变量对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表1建构了5个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以分析家庭资本对子女高中阶段教育质量获得的影响。模型1是基础模型,包括性别、家庭居住地、同胞数量等控制变量;模型2至模型4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纳入“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变量;模型5同时放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以验证三者一起进入模型时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模型1结果显示,女生进入一般普高和优质普高(相较于进入职业高中)的可能性分别是男生的0.63倍和0.68倍。城镇居民进入优质普高的发生比是农村居民的2.1倍。同胞数量对进入一般普高无影响,但对升入优质普高影响显著,独生子女进入优质普高的可能性是非独生子女的将近2倍。初中就读于城镇中学的学生进入一般普高和优质普高的机会分别是就读于农村中学的3.2倍和3.4倍。对比一般普高与优质普高,性别差异和初中就读学校类型的影响不再显著,但家庭居住地和同胞数量的影响依然存在。

模型2加入了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回归分析发现,家庭教育投入多寡对子女能否进入一般普高和优质普高(以职业高中为参照)均无显著正向影响。在优质普高与一般普高的比较中,家庭教育投入变量的影响亦不显著。

模型3考察了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首先,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升入优质普高(相对于职高)的概率增加15.2%。其次,家庭藏书量也仅与子女能否进入优质普高(相对于职业高中)正向相关。此外,家长教育理念对子女升入一般普高和优质普高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比优质普高与一般普高,三个变量中仅有家长教育理念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藏书量对子女进入优质普高(相对于一般普高)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① 将选项中的小学赋值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职高、中专、技校为12年,大专为15年,大学本科为16年,研究生为19年,博士为22年。

表 1 家庭资本对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影响的分层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一般普高 VS 职高	优质普高 VS 职高	优质普高 VS 一般普高	一般普高 VS 职高	优质普高 VS 职高	优质普高 VS 一般普高	一般普高 VS 职高	优质普高 VS 职高	优质普高 VS 一般普高	一般普高 VS 职高	优质普高 VS 职高	优质普高 VS 一般普高	一般普高 VS 职高	优质普高 VS 职高	优质普高 VS 一般普高
性别 (男)	0.492** (0.186)	0.521* (0.227)	0.029 (0.180)	0.495** (0.186)	0.521* (0.227)	0.026 (0.181)	0.403* (0.193)	0.389 (0.235)	-0.014 (0.184)	0.341 (0.192)	0.381 (0.234)	0.040 (0.184)	0.255 (0.201)	0.240 (0.244)	0.001 (0.187)
家庭居住地 (乡镇)	-0.110 (0.254)	0.762* (0.316)	0.872** (0.270)	-0.121 (0.255)	0.757* (0.316)	0.878*** (0.270)	-0.160 (0.265)	0.501 (0.329)	0.661* (0.227)	-0.080 (0.259)	0.804* (0.324)	0.885** (0.277)	-0.096 (0.271)	0.651 (0.056)	0.709* (0.282)
同胞数量 (非独生)	0.145 (0.187)	0.674** (0.238)	0.529** (0.197)	0.128 (0.188)	0.664** (0.239)	0.537** (0.198)	0.132 (0.194)	0.527* (0.247)	0.395* (0.203)	0.112 (0.192)	0.636* (0.243)	0.524** (0.198)	0.080 (0.201)	0.505* (0.047)	0.421* (0.204)
初中学校 (农村)	1.175*** (0.258)	1.217*** (0.316)	0.042 (0.269)	1.120*** (0.265)	1.186*** (0.324)	0.066 (0.273)	1.096*** (0.266)	1.029** (0.325)	-0.066 (0.274)	1.217*** (0.263)	1.189*** (0.322)	-0.027 (0.273)	1.067*** (0.278)	1.005** (0.343)	-0.056 (0.281)
家庭 教育投入				0.153 (0.163)	0.085 (0.208)	-0.068 (0.141)							0.173 (0.174)	-0.010 (0.225)	-0.183 (0.151)
父亲 受教育程度							0.061 (0.041)	0.141** (0.048)	0.080* (0.037)				0.069 (0.043)	0.144** (0.050)	0.076* (0.038)
家庭藏书量							0.000 (0.001)	0.004* (0.002)	0.003** (0.001)				0.001 (0.002)	0.005** (0.002)	0.004** (0.001)
教育理念							0.552*** (0.092)	0.505*** (0.117)	-0.047 (0.103)				0.452*** (0.072)	0.401*** (0.090)	-0.051 (0.077)
亲子沟通										0.215* (0.098)	0.198 (0.121)	-0.017 (0.099)	0.312** (0.106)	0.358** (0.129)	0.047 (0.103)
行为监督										0.537*** (0.096)	0.601*** (0.120)	0.065 (0.101)	0.531*** (0.100)	0.580*** (0.125)	0.050 (0.104)
家长与 老师的联系										0.056 (0.096)	0.234* (0.116)	0.177* (0.091)	-0.193 (0.109)	-0.073 (0.575)	0.120 (0.099)
N	861														

注:(1)括号中为标准误;(2)* $p < 0.1$; ** $p < 0.05$; *** $p < 0.01$ 。

资料来源:课题组对江苏省 B 县 2017 届初中毕业生家庭教育与教育分流关系的调查数据。

模型 4 显示了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在反映家庭社会资本的变量中,“亲子沟通”仅对子女进入一般普高有显著促进作用,亲子沟通每增加 1 分,子女进入一般普高(相较于职业高中)的优势比增加 23.9%。“家长与老师的联系”仅对子女进入优质普高有显著正向影响,家长与老师沟通的频率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进入优质普高(相较于职业高中)。而“行为监督”对子女进入一般普高和优质普高均有正向影响。家庭行为监督每增加 1 分,子女进入一般普高和优质普高的概率分别增加 71% 和 82.4%。在优质普高与一般普高的比较中,亲子沟通与行为监督的影响均不再显著,但家长与老师的联系对子女进入优质普高仍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模型 5 同时纳入了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变量,可以完整地反映三种类型的家庭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首先,与模型 1 相比,性别、家庭居住地、同胞数量和初中学校类型的系数逐渐降低,且性别变量的显著性消失,说明家庭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城乡分割、性别差异、同胞数量导致的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不平等。其次,与模型 2 相比,家庭教育投入的回归系数明显变小,这意味着经济资本很可能以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中介发挥作用。再次,从模型 3 到模型 5,文化资本原来显著的变量依然显著,且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藏书量的系数浮动不大,表明制度化文化资本和客观化文化资本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具有稳定、独立的正向影响作用。此外,家长教育理念的回归系数有所上升,表明具身化文化资本与其他家庭资本变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最后,随着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纳

入,亲子沟通与行为监督变量的回归系数呈上升趋势,表明家庭内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而家庭外社会资本(家长与老师的沟通频率)由正效应变为负效应且不再显著,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层面的家庭资本变量后,家庭外社会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不再产生影响,家庭外社会资本很可能通过其他家庭资本变量发挥作用。

(二)家庭资本变量贡献率的比较

本研究通过计算标准化 Logistic 回归系数,比较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见表2)。比较发现,对于普通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相较于职业高中),社会资本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大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有限;而对于优质普高教育机会的获得(相较于一般普高),只有文化资本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对于升入一般普高和优质普高(相较于职业高中),主观性因素(家长教育理念、亲子沟通和行为监督)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客观性因素(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藏书量);而对于升入优质普高(相较于一般普高),客观性因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明显大于主观性因素。这说明,在普职分流中,主观性因素比客观性因素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而在优质普高与一般普高的分流中,二者的影响恰恰相反。

表2 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模型(模型5)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自变量	一般普高 VS 职高		优质普高 VS 职高		一般普高 VS 优质普高	
	B	β	B	β	B	β
家庭教育投入	0.173	0.017	-0.010	-0.001	-0.183	-0.015
父亲受教育年限	0.069	0.002	0.144**	0.004	0.076*	0.002
家庭藏书量	0.001	0.000	0.005**	0.000	0.004**	0.000
家长教育理念	0.452***	0.018	0.401***	0.020	-0.051	-0.002
亲子沟通	0.312**	0.018	0.358**	0.025	0.047	0.003
行为监督	0.531***	0.029	0.580***	0.040	0.050	0.003
家长与老师的联系	-0.193	-0.012	-0.073	-0.023	0.120	0.007

注:五个模型中显著的自变量均列入表中,* $p<0.1$,** $p<0.05$,*** $p<0.01$ 。

六、结论、讨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高中生家庭教育情况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了家庭资本对学生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并通过测算标准化回归系数比较了家庭资本各要素对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相对贡献。

(一)结论与讨论

1. 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

从城乡差异来看,城市学生在优质普高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优势地位仍然存在,城镇初中学生与农村初中学生在一般普高和优质普高的入学机会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从性别来看,一般普高和优质普高教育机会获得的性别差异均不明显。从同胞数量来看,相较于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在优质普高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劣势地位突出。这种差异可以用资源稀释理论进行解释,即子女的数量越多,分配给每一个孩子的资源就会被稀释,进而降低其进入优质高中的可能性。

2. 家庭资本对学生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呈文化再生产模式

从总体上看,三类家庭资本中只有文化资本对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相对稳定、独立,不太容易受到其他家庭资本因素的“干扰”,且在一般普高与优质普高的教育机会获得方面,三类家庭资本中只有文化资本具有预测力。李煜曾提出家庭背景影响子代教育获得的三种模式,即资源转换模式、文化再生产模式和政策干预模式,并指出,当教育体制遵循绩效原则、教育机会分配依据学业表现择优录取时,家庭文化资本能够转化为子女个人的学习动力、学习表现,进而影响教育机会获得^①。本研究再次验证了这

^① 参见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一结论,即在入学筛选遵循择优录取原则的高中阶段,家庭资本对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呈文化再生产模式。

3. 家庭经济资本对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投入的多寡对子女能否进入一般普高(较之于进入职高)和优质普高(较之于进入职高和一般普高)均无显著影响。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存在较大差异^①。笔者认为,一方面这与县域内贫富分化不突出、小学与初中学校间分层分化现象不严重、民办学校和校外培训行业发展不充分有关,若对大城市开展调查,其研究结论可能会与本研究存在出入。另一方面,我国高中阶段“依据学业表现择优录取”的入学选拔标准避免了家长直接利用经济资本优势争夺优质教育资源(如购置学区房)的择校行为,这也是经济资本作用弱化的重要原因,但并不能就此说明家庭经济资本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消失。有研究指出,因儿童所处的家庭氛围、学习环境以及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的不同,经济资本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也存在差异^②。本研究也发现,经济资本很可能以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中介发挥作用。因此,经济资本能否促进子女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关键在于其能否转化为“有效”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4. 文化资本影响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限度

本研究发现,家长教育理念对子女进入一般普高和优质普高(相较于职业高中)具有正向影响,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藏书量对子女进入优质普高(相较于一般普高)具有正向影响。换言之,弱势阶层家长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期望、提供教育支持、重视教育价值等方式,降低子代进入职业教育轨道的风险。但是上述影响是有限度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只能提高子女的普通高中入学机会,对其获得优质普高的教育机会没有显著影响。只有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文化产品较丰裕的家庭,其子代才能在优质普高的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优势。该结论表明,文化资本对高中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实际上存在文化流动与文化再生产的两元路径(见图 4),即弱势阶层可以通过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帮助子代向一般普高流动,但在进入优质普高时,面临着难以逾越的“玻璃天花板”;优势阶层则依托自身教育水平和家庭文化资源,保障其子代在优质普高教育机会获得中的优势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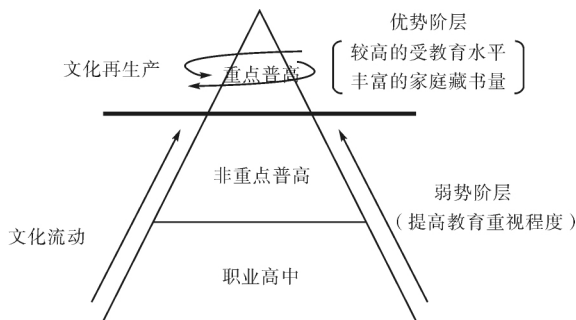


图 4 文化资本在高中教育机会获得质量中的作用机制

5. 社会资本中行为监督对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影响大于亲子沟通

家庭内社会资本(亲子沟通和行为监督)对学生进入一般普高(相较于进入职业高中)和优质普高(相较于进入职业高中)的影响显著,且行为监督的影响远大于亲子沟通。这也验证了“‘权威性教养更有利于学业成就,而专制型教养不利于学业成就’这一在美国白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规律,并不适用于东亚裔群体”的研究发现^③。

究其原因,一是受传统儒家伦理和教养习惯的影响,中国父母更注重对孩子行为的监管、约束和指导,

^① 参见 J. D. Teachman,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no. 4, 1987, pp. 548-557.

^② 参见 W. J. Yeung, Miriam R. Linver and Jeanne Brooks-Gunn, “How Money Matters for You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Family Processes,” *Child Development*, vol. 73, no. 6, 2002, pp. 1861-1879.

^③ 参见 Laurence Steinberg, Sanford M. Dornbusch and B. Bradford Brown, “Ethnic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Achievement: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Psychologists*, vol. 47, no. 6, 1992, pp. 723-729.

与子女的情感沟通相对缺乏；子女也习惯于接受父母行为上的规训，较少从亲子沟通中获得情感能量并转化为学习动力。

二是由于大部分学生学习意志力和自觉性、自主性不强，与竞争激烈的中考所要求的高强度学习状态不匹配，父母对子女学习与生活的监督、管理能够帮助其在优质高中教育机会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这就意味着教养方式与学业成就的关系，需要放在不同的文化与教育生态系统中讨论。在应试教育、升学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中，考试成绩成为衡量学生学业成就的全部或主体；模式化、套路化、不断重复的解题操练对于提高考试分数是有效的。因此，家长对子女的行为监督能够使后者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在知识学习和解题操练上，进而帮助其在中考的分数竞赛中获得优势。如果在教育教学和考试、招生中真正贯彻了素质教育，升学竞争减弱，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变。此外，这个结论或许暗示在东亚国家的学生身上存在着应试型人格，他们自愿接受来自家庭、学校的监督与规训，内化学业压力并转化为动力，自我约束，在应试教育和学业竞争内部找到学习乐趣，进而为了在升学竞争中获得成功，主动沉浸在“题海”之中。但是这类学生在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或职业生涯后，是否仍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仍需在后续的专门研究中探索。

此外，家长和教师的联系对子女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无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为，目前的家校沟通往往是教师在学生出现问题后，单方面向家长通报孩子的学业表现，家长只是被动配合且获取的信息相当滞后，缺乏家长与教师关于孩子的深度沟通，故对孩子的影响不大。

6. 家庭资本中的主观性因素影响普职分流，客观性因素影响一般普高与优质普高的分流

在家庭资本的各因素中，家长教育理念、亲子沟通、行为监督等主观性因素在普职分流中的作用大于家庭教育投入、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藏书量等客观性因素，这为弱势阶层子女获得普通高中的入学机会提供了努力的方向。家长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期望，为子女提供充分的学习支持，建立民主、平等、互动的亲子关系，加强学业指导和监管等方式，提升子女获得普通高中入学机会的优势。但家长教育期望表现出的积极作用必须建立在适度的基础上。已有研究发现，家长教育期望过高，可能会挫伤子女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导致亲子关系紧张、子女心理压力过大，甚至触发厌学、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反而会对孩子的学业表现产生负面影响^①。

在一般普高与优质普高的教育机会获得方面，上述主观性因素的作用不再显著，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藏书量等客观性因素的影响显著，这表明主观性因素虽然有助于弱势阶层子女获得普通高中入学机会，但客观性因素会对其获得优质普高入学机会产生制约。而与主观性因素动态可调节的特征相比，客观性因素往往是静态的且难以改变。

(二) 促进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公平的建议

为了促进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的公平，弱势阶层家庭可以通过重视子女教育，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保持适度的教育期望，建立民主、平等、互动的亲子关系，加强对子女教育的参与程度等方式培育主观性的家庭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子女进入普高的机会。同时，政府、学校和社区也必须通过文化建设等方法弥补此类群体家庭资本不足造成的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不公平，这也能够弥补家庭资本中客观性因素难以改变所造成的教育不公平问题。

首先，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为其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文化学习、学业指导等方面的帮助。

其次，社区可以开发和培育社区文化资本，如兴建社区图书馆、组织社区文化活动，对弱势家庭进行家庭教育理念、方法的辅导，让弱势阶层家长及其子女能够在社区这一场域中获得更多文化资源，最终提升其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

再次，政府一方面应加强县域内各高中建设，提高县域各高中的教育教学质量，降低其与市属、省属知名高中之间的差距，增强县域高中的吸引力，为县域初中毕业生提供更多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要逐步实现县域内高中的多样化发展和均衡发展，缩小县域内各高中教育质量差距，从根本上解决学生

^① 参见李适源、刘爱玉：《家庭背景对学业表现的作用机制研究——以亲子教育期望偏差为解释中介》，《教育探索》2019年第6期。

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差异和质量公平问题。此外,由于家庭背景中的客观性因素影响优质普高的教育机会获得,而这些客观性因素难以改变,为了不让优质普高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公平持续下去,为了提高弱势阶层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政府还应当采取补偿性政策,推进、加大优质普高招生指标均等分配到各初中的力度。

责任编辑 曾新

The Family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the Access to High School Educ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Differentiation in County B of Jiangsu Province

Zhu Xinzhuo Luo Jingya

(School of Edu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Abstract :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y of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access to high school education has a critical influence on the ch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Therefore, it is one of the topics in educational equality research. Students' high school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re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family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their high school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students' educational tracking after junior high school in County B of Jiangsu Province find that, economic capital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of common high schools and quality high schools (compared with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while social capital has a positive effect, and cultural capital has a positive impact but weaker than social capital. Only cultur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ccess to quality high schools (compared with common high schools). Among the factors of family capital, the subjective factors can help the children of disadvantaged families to obtain opportunities for common high schools, but the objective factors will restrict their opportunities for quality high school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the high school "quota allocation policy"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student resources between common high schools and quality high schools. In addition, the disadvantaged families should actively cultivate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should also provide various support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of these families,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ir children's high school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Key words :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amily capital; high schoo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educational tracking after junior high school